

一 豆剖瓜分 话缘起细 说大势

1. 上帝与天尊的对垒

中华民族，具有着自己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具有着自己辉煌灿烂的历史，在人类发展史上，曾创造了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光荣与骄傲，同时也使民族生生不息地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虽然早在盛唐时代，西方宗教即传入中国。但是，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都是以传统的儒、道、释三家精义作为自己信仰的依归，严谨地遵循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而生活着、奋斗着、创造着。当一些心怀治平天下大志的人们希望自己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番积极进取时，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

儒家精神就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引导他们自强不息地为社会工作，为天下生民谋福利；当一些人厌倦了尘世的烦嚣，想求得自身的解脱或心灵的宁静时，他们则又会皈依于中国传统的道教或早已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佛教，栖息山林，逍遥江湖，修真参禅。

即便对中国广大的基层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切于自己的实在生活，而这实在的生活又需得到诸神的庇佑。于是，他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宗教——道教——更有着最直接而浓厚的兴趣。这也是必然的，道教以先秦原始道家学派的主张为自己的教义，从其创立伊始，就与下层民众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修道之士固然以得道成仙为自己宗教实践的最终目的，对道教的教规谨遵不渝，对三清道祖、玉皇天尊及天地间诸神顶礼膜拜；普通民众虽然对道教教义不甚了了，甚至也弄不清天庭之中三清道祖与玉皇大帝孰尊孰卑、先天诸神与圣哲之仙之间存在着何样的差别，更不去寻求自己的得道成仙，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高居天上的玉皇大帝就是宇宙间的最高尊神，他和他领导的三界诸神，洞察着人间的是非善恶，掌管着人间的吉凶祸福。因此，不管怎么说，他们相

信，玉皇大天尊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最神秘而又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要对其顶礼膜拜。

中国人有着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这种文化和宗教又正是与现实的生活协调一致的。所以，数千年间，中华民族的文明稳步地向前进展着，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断绝。

但是，这种情况在 19 世纪尤其是这一世纪之末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原因就是西方的“上帝”这时再也不甘中国人千百年来对它的排斥，它逞起了自己一贯的独断和蛮横，凭藉着自己西方子民的坚舰利炮，踏海来到东方的中国，要把天尊的影响从中国人的信念之中驱逐出去，要把东方人从天尊的统辖下夺走，纳入自己子民之列。于是，这时的西方传教士们，一反往昔的卑躬，开始叫嚷“要为上帝征服中国”了。

2. 大刀会偏不信邪

基督教的东传，由来已久。但是，基督教之三大教派——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是不尽相同的。基督教在

其尚未分裂之前，曾经两度传入中国：最早的一次是在唐朝，基督教中的一支由波斯传入中国，当时称作景教；第二次是在元朝。虽然当时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优容了它的存在，但由于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人的传统信念格格不入，当时极少有人对其加以理睬和信仰。于是，这两次的传入也都自生自灭，如同一缕轻烟，在中国的天空中飘荡了一番后，消散净尽了。

到明朝至清朝中期，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卷土重来，再一次传入中国：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耶稣会的方济格·沙勿略教士最早把天主教带入中国；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马·列昂节夫教士把东正教传入中国，并在北京建教堂；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马礼逊教士又把基督新教传到了中国。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怀着对上帝的无限忠贞和拯救“东方罪民”的慈悲之心，不远万里，跨越重洋，来到中国，要把“福音”传遍这一片拒绝上帝的土地，以说服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民认识到自身的罪孽，自新获救，从而把中国的民众从他们自己所尊崇的神的掌握下争夺过来，皈依于万能的天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传

教士们来到中国后，华语儒服，适应中国民族的心理和习俗，采取中国民众所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教。与此同时，他们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近代科技知识，并兴办学校、医院和其他慈善机构。他们的这些作为，在客观上倒是有利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而他们自己的事业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到明崇祯末年，天主教已遍布中国的各个重要地域；至1667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已有26万多人，教堂183座，教士住院53所；到1700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增至30余万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伴随着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的到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又一次大批涌入中国。从此，基督徒宗教活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于条约中明文规定准予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并给予他们许多特权。从此，洋教士们一反他们在此之前的传教方式，一变而成为具有着宗教文化的传播者和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的侵略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西方传教士以殖民主义者的坚舰利炮作为自己传播福音的有力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作为自己的护符，在神州国土上，南北穿梭，无孔不

入，强行推行“中华归主”；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侵略者在凭借坚舰利炮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的同时，也相中了具有着特殊身份的传教士们，有意识的对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加以利用，把教徒们所虔诚向往的“中华归主”现实化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于是，到 19 世纪末，在侵略中国的行列中，又增加了一支特别行动队，这就是身披教士服、手持福音书的洋教士们。大炮与《圣经》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工具。

由于有不平等条约作护符，有强有力的武力作后盾，洋教士们不需要再如以前那样迁就中国的习俗和文化，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横行开来。他们所到之处，霸占土地，强买强卖，网罗入教，聚敛财富，包揽词讼，欺凌官长，犯下了累累恶迹。教堂所在，也多成为凌驾于中国地方政权之上的权力中心，成为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国中之国”，对中国人民实行无厌的压迫和剥削。

不远千里踏海而来的传教士们，此时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本分是要为主在中国传播福音。他们有的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有的潜入中国内地或边陲，为全副武装的侵略者充当间

谍刺探情报；有的深居幕后，为侵略者出谋划策，充当谋士；有的霸占田产，施放高利贷，盘剥乡里；有的延揽无赖劣绅入教，欺凌百姓，甚至无端杀人。此外，各国传教士还都逾越权柄，插手中国官场，与中国各地各级官吏分庭抗礼，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如此情形，不一而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洋教士在中国更是无法无天，横行无忌。据不完全统计，到 19 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耶稣教、俄国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 3200 多人，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建立教区 40 多个，教会 60 多个，延揽教徒达 80 余万人。这样一支庞大的教会势力，在当时中国民众的心目中，直是罪恶的渊藪，苦难的根源，而那些背叛了自己的祖先和天尊加入洋教的教民们，则被视作为虎作伥的仇敌。于是，中国的广大民众，在饱受了侵略者的压迫和欺凌之后，慢慢开始觉悟，从一般的民教冲突走上了更激烈的武装反抗的道路。

甲午战争之后，第一次规模较大并直接推动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反洋教斗争是山东曹县的大刀会起义。

1894 年，当中日甲午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地区，以山

东曹县、单县为中心，兴起了一种名为“大刀会”的民间结社，其首领有曹县烧饼刘庄的监生刘士瑞和单县曹楼的曹得礼等。大刀会原是一支民间的武术团体，日常练习一种名为“金钟罩”或“铁布衫”的硬气功，据说功夫练成之后，能不怕刀砍斧剁、枪击炮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刀枪不入。这种硬气功发源很早，在中国武术史上早见记载，但由于它在清朝前期一直在八卦教的一些支派中传习，所以始终带有一些秘密宗教的气息。

列强对中国日益深刻的侵略和洋教士的横行不法，加之地方土匪盛行，使下层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刘士瑞等人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在创立大刀会之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保卫家身”、“兴华灭洋”的宗旨。刘士瑞等带领着大刀会的会员们，凭着自己手中的大刀，与手持洋枪的土匪们展开过多次交锋，先后打败段瞎子、岳二米子等著名匪股，成为维护一方民众生活的有力保障。

1896年2月4日，以行医为生的大刀会成员郝升和到吕登士家讨还药费。吕登士一家尽入洋教，他倚仗有洋教庇护，赖账不给，双方当下发生口角。吕登士的族人吕菜指着郝升和鼻子骂他是白莲教妖人，惹得郝升和勃然大

怒，回口骂他为羊羔子教庇护下的匪人，双方忿忿而散。这本是一场小小的口角之争，两下相安也即无事，但是吕菜等入教之后，恃有靠山，动辄张口骂人，抬手打人，几时受得如此回敬，此番与郝升和的口角，令他十分光火，乃找到教堂的教师张连珠，添油加醋地把此事说了一番。张连珠亦非善类，当下带着一些无赖教徒，到郝升和门上寻衅，搅得郝家鸡犬不宁。郝升和无奈，只得找到大刀会首领曹得礼，告以此事。曹得礼因觉此事又涉民教利害，就去找刘士瑞商量。刘士瑞平日最恨洋教徒藉势欺人，一听此事，不禁心下冒火，当即率一批大刀会员来到教堂，与张连珠理论。不料张连珠口出不逊，当场激怒了刘士瑞和其他大刀会会员。刘士瑞一声令下，大刀会员们一拥而上，攀缘登房，立时拆毁了教堂。可这一股怒气没有散尽，于是，刘士瑞等沿途又把其他 15 座教堂概行拆毁。一时之间，洋教士们东躲西藏，无赖教民们也人心惶惶。

山东教区属德国天主教范围。德国驻华公使绅珂闻知此事后，即于 4 月 14 日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查明此事，并对被毁教堂予以赔偿。此事尚未交涉完毕，刘士瑞又率领大刀会在山东展开了

更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

在山东和江苏两省的交界处，有一片湖地，当地人称作湍地。按以往成例，这些湍地，谁开垦出来耕种，收获就归谁所有，不必向官府完粮纳税。砀山大刀会首领庞三杰在这里拥有不少湍地，年年耕种，颇有收成。地主刘荃臣一直对庞三杰所拥有的湍地心怀覬覦，但因庞三杰势大，始终不得下手。刘荃臣加入教洋后，觉得有洋教撑腰，胆子便大了起来。1896年初夏时分，刘荃臣带人抢割庞三杰湍地里成熟的麦子，庞三杰找其说理，不得结果。庞三杰忍无可忍，乃致书刘士瑞，请其出面相助。刘士瑞得信后，即于6月15日派其子刘孔章和徒弟牛金声、彭智林、智效忠等人率领曹、单大刀会一千余人前往砀山，自己则留在曹县组织大刀会各支同时起义，驱灭洋教。大刀会在砀山打垮了以刘荃臣为首的教会势力，并乘势拆毁了东湍子教堂。同一天，曹县、单县、砀山、丰县、亳州、虞城等州县的大刀会同时起义。他们首先赶到单县贾庄，拆毁教堂；16日，转至后河滩，17日开到赵庄，19日到达葛楼，沿途之上大刀会拆毁洋教堂，没收教民财产；21日各路大刀会队伍分路出击，拆毁数十处教堂，抢掠教民家产。至25

日，大刀会开至江苏丰县的戴套楼，拆除当地教堂。所经之处，洋教堂尽化乌有，传教士和教民仓皇逃窜。与此同时，庞三杰、牛金声等大刀会首领，纠集会众 500 多人，于 6 月 28 日包围了单、碭两县交界的马良集，并于次日攻入集内，拆毁教堂，抢砸店铺，同时还砸毁了江南裁缺外委衙门。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只要社会处于动荡时期，下层民众就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为谋求自身的生路而与统治阶级展开武装斗争。当其刚刚兴起之时，也许只在极小的地域范围内进行，一旦朝廷无力将其弹压下去的时候，它就必将由星星之火发展成难以扑灭的燎原之势。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集团，对下层民众的哪怕是一点极小的骚动，也都不敢轻易放过；而那些参与其事的起义民众，在斗争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其本身所固有的落后性，对斗争的策略和方式往往不会有太多的顾及。

清政府虽然在屡经战败后，再也无力与列强抗衡，但是对于自己子民的越轨行为却还是要严加镇压的——只是不管这些民众缘何而起——毕竟在饱受了外患侵袭之后，孱弱不堪的清王朝再也经不起内部的动荡了。所以，只要

还有些许的力量，就得把一切意图动摇大清皇朝根基，或者是会令朝廷在中外交涉中处于被动难堪境地的民众闹事行为，严行镇压下去。6月24日，清朝廷得知大刀会反教起义后，立即电谕山东巡抚李秉衡，责令他速与江苏、安徽两省地方当局协商会剿。7月3日，清廷再度电令李秉衡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火速派出军队，对大刀会严加弹压；如果大刀会胆敢抗拒，则予就地剿灭。

但刘士瑞等人却就是胆敢抗拒，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刀兵相见。清廷得讯后，再次严令李秉衡和毓贤等实力会剿，不得留有后患。李秉衡奉有朝廷严令，自不敢稍事怠慢，当即严饬毓贤，会同兗沂道锡良驰往当地查办，并飞调候选道马开玉所部3营，分往曹县、单县和鱼台等处，会同原有清军相机弹压；同时，李秉衡还委派候补知府杨传书等人分往各处，随同官员前往开导镇压；兗州镇总兵田恩来也带兵开往鱼台，与毓贤等人会商策应。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奉命派兵会剿。

大刀会虽然是一有组织的民间武术团体，激于一时义愤而发动起义，抗教反洋，但是，它势力的发展，尚不足与清朝廷的正规军相对抗。在李秉衡等人的镇压下，大刀会成员死伤

数百人，刘士瑞、曹得礼也分别于 7 月 7 日和 11 日被毓贤设法诱捕，遭到杀害，大刀会起义转入低潮。

大刀会起义又一次把清政府推到外交上的难堪境地。侵华列强每每借民教冲突向清朝廷狮子大张口，勒索巨额赔款，使清政府难以应付。这一次，德国人也同样没有例外，经过一番交涉争执，最终还是由清政府责令地方当局送银抚恤各村受扰教民，建堂赔偿，具结此案。

虽然刘士瑞等人遭到杀害，由他们组织发起的大刀会反教起义也最终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次起义对山东乃至全国的反教会斗争的开展和其后不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很多大刀会成员在起义失败后转移到其他地区，并在各地点燃了反洋教斗争的熊熊烈火，成为各地反抗斗争的骨干力量。

3. 安治泰相中山东

近代史上，列强国家在中国的“保教权”，一直掌握在法国人的手中。但是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这种局面却被德国人打破了，这一

一切都与一个名叫安治泰的德国传教士有关。

本来，德国属于新教国家，罗马教皇是不容许它拥有在中国的保教权的。但列强国家一直把在中国内地传教视作它们对华进行武装侵略和经济侵略的一个直接而有力的手段，绝不甘心让法国人一手独揽，于是纷纷向法国人发难。1878年，在教皇里奥十三即位之后，德国即出于攫取教权的目的向他表示好感。1882年，德国驻法公使即向法国政府提出要求，声称自己须保护德国在中国的传教士。此后不久，德国驻华公使也向李鸿章提出此事。德国虽然是新教国家，但是其经济实力的强大，使罗马教皇也不敢轻易地惹怒它，对它抱着一种拖延的态度。此时安治泰已经到中国山东传教了。

安治泰生于1851年，1879年被德国天主教圣言会派遣来到中国。他先在香港学习了一年汉语，然后在山东烟台、济南等地活动，不久，即在山东南部建立了德国天主教会。1886年，德国人在山东建立教区，安治泰被罗马教廷任为主教。在山东传教期间，安治泰于1885年和1887年先后两次在山东兖州城内强买民房，修建教堂，遭到当地民众的激烈反对。为了达到目的，他又跑到北京，强迫清政

府总理衙门对其支持，但没有成功。

德国人图谋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保教权，安治泰起了很大作用。凭着他在山东多年的传教活动，安治泰认识到山东位置的极端重要性：山东省地处北方沿海，逼近中国首都北京。掌握了这一地区，足可使德国对清政府施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山东东部沿海多有良港，海路通畅，可为德国海军提供非常完善的基地，一旦德国人掌握这一地区，则将来不论列强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德国人都会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也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德国决心从法国手中夺取这一地区的保教权，安治泰也积极从中推波助澜。

德国政府首先授意安治泰，让他写信到罗马教廷，向教皇提出德国人享有山东教区保护权的要求。同时，德国驻华公使巴德闾也对教廷表示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在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下，法国外交部首先作出妥协；罗马教廷本不敢开罪法国，此时见它自己先作出让步，乃做出一种表面看来两方都不得罪的处理：让安治泰代表德籍在华传教士，挑选是让法国保护还是让德国保护——这正中德国政府和安治泰本人的下怀，其结果自是不言而喻了。

安治泰在致教廷的信中诡称：德国作为一

一个新教国家，自己本来不愿意接受它的保护；但是，德国政府向来对山东注入了极大的关切，如果自己违逆德国而选中法国保护的话，则德国就很可能对他在山东建立的教会不利，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方面为难他，从而使他在日后的布教活动中遇到麻烦——这同样是人人皆知的谎言：实际上，早在德国人向教皇提出教权要求之前，在华的德籍传教士就拿着法国政府的护照为德国政府服务了。德国人终于如愿以偿了。1890年安治泰由中国回到柏林。由于他在德法两国争夺山东教权时的出色表演，德国皇室和政府在北京隆重地接待了他。不久，安治泰正式向教皇提出了德国保护权，次年一月，教皇答应了他的要求。从此，山东教权正式落入德国手中，安治泰也由此声名显赫，俨然成了德国在山东的代表。回到山东后，安治泰又向清政府索取了三品、二品的顶戴，竟然与山东督抚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煞有介事地做起了山东的太上皇了。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使列强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懦弱无能，进而认识到分割中国的时机已然成熟。英、法两国首先在中国西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897年2月4日，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英国公使窦纳乐

签订《续议滇缅条约附款》和《西江通商专条》，将中国云南南部昔马、科干等处划归英国，南坎地区则由中国永远租给英国，使中国丧失了西南边境的大片领土；开放西江通商；中国政府事先未经与英国商定，不得将江洪地区和孟连地区让与他国；中国如将来在云南修路，允与缅甸铁路相接，等等。这样，英国通过强逼清政府与之签订的这些条款，大大加强了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势力，同时也阻挡了法国势力向西的扩张。

法国人在与德国人争夺山东教区的保护权时遭到了失败，这时自是不甘心英国人的又一次压迫。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向总理衙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极力反对清政府与英国人签订的这两个条约，同时要挟清政府给予法国以“补偿”：除了向中国政府索取筑路、开矿等新的特权外，还提出海南岛及粤东海岸不得让与他国屯煤的要求。清政府终于屈服于法国人的淫威，被迫接受了法国的要求。1897年3月15日，总理衙门照会法国使馆，正式承认不把海南岛让于其他国家，法国人的要求终于实现，施阿兰为此得意洋洋。

清政府对某一国家所宣布的所谓不把某一地区割让其他国家，也就意味着承认这一地区